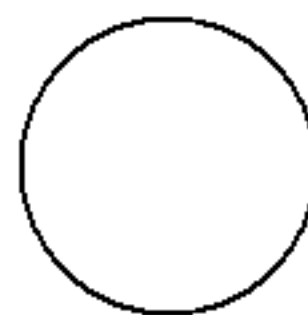


红 旗

H O N G Q I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



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南针

——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

一九六五年

8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五年第八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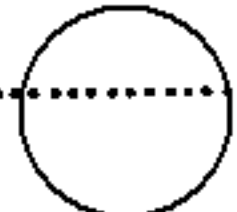
目 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 贺 龙 (1)

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南针

——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 陶 铸 (16)

诗词十首 郭沫若 (31)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矛盾恐惧症  毛况生 (34)

教练工作杂记 傅其芳 (42)

☆ 七月三十一日出版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

贺 龙

在军队中是否实行民主，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领导的反革命军队在军队内部关系上的一个根本区别。人们知道，一切军队都是专政的工具。反动统治阶级的反革命军队，是对人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对反革命实行专政的工具。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反革命军队，因为它是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是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为敌的，所以它在内部决不敢实行民主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则不同，因为它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利益的军队，即保卫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利益的人民军队，所以它除了对反革命实行专政以外，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主的；在军队内部是可能和应该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办事的。也就是说，是可能和应该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并且在民主基础上实现高度统一集中的领导的。

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特色之一，就在于这支军队在自己内部实行了群众路线，实行了有领导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军队建设上的伟大创造，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伟大贡献，是毛泽东同志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创造出那么多人间奇迹？创造出那么多军事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力量，使我军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挡住，能够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军队是一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的人民军队，就在于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是为了人民的解放的正义战争，是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的真正的人民战争。由此出发，我们同一切旧的军队旧的军事传统彻底决裂，不但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而且完全打破了那种认为军队要



打仗要服从命令，就不能有民主的陈腐观念，創造了历史上第一支真正讲民主的属于人民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同志在创建我军之初，就提出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①的光辉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在长期的建军和作战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以三大民主为内容的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民主传统。毛泽东同志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总结了我军民主运动的经验，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②。按照毛泽东同志这些教导，我们在军队中实行了最广泛的民主，实行了群众路线，处处相信群众，事事依靠群众，这就使我们获得了一切反动军队所无法获得的伟大力量。

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都是镇压人民的暴力工具，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势力。这种军队的反人民的阶级性反映在军民关系上，是军民对立；反映在军队内部关系上，便是官兵对立。这种对立关系，决定了它不能不实行愚兵政策和压迫政策，决定了它在上下、官兵之间的关系上，只能提倡不准过问是非曲直的所谓绝对服从，决定了它不仅不会有民主，不敢有民主，也不允许有民主，而且还动辄用打骂枪毙等等野蛮办法来维持军队的纪律。因此，从根本上说，军民对立、官兵对立，在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中，是普遍的，毫无例外的。

在无产阶级的军队诞生之前，某些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军队，虽然也实行过一些带有民主色彩的措施或制度，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他们的阶级局限性，这些措施或制度也只能是自发的、零碎的、不彻底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思想，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来反动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对立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勤务员，人民自己求解放的工具。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它不因为手里有枪而欺压人民，不因为作战有功而以人民的恩人自居。所以，我军能够到处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人民和军队的这种高度的团结一致，形成了一道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思想，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扫清了一切旧军队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对立关系，在军队中造成了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7页。

②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5页。



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集中领导下，用民主的方法办事，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已经成了我们根深蒂固的光荣传统和制度，已经成了我们全军上下普遍的生活习惯。无论是在连队、在机关、在学校，也无无论是工作、训练还是打仗，都是讲民主的。大至方针政策、作战计划，小至日常事务、批评表扬，通常都是经过充分酝酿讨论，然后作出决定、采取行动的。在我们部队中，可以说，上上下下，时时处处，都充满着民主。由于民主的广泛发扬，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人人都感到自己是主人翁，军队中的事情，“人人自觉管，事事有人管”，“好事人人夸，坏事人人揭”。大家都自觉自愿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真正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战斗集体。这样，我军就能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苦，不怕死，英勇杀敌，成为一支无敌于天下的军队。

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的贯彻执行，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和和乎乎的。在中国要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历史上破天荒第一遭，不能不遇到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阻挠，不能不遇到各种各样旧的成见和习惯势力的抵制。事实上，从我军建军一开始，那些沾染有旧式军队习气的人，抱有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成见的人，就顽固地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他们在反对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同时，还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来反对民主运动，抵制群众路线。显然，如果不反复地破除这种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影响，不反复地破除这种成见和习惯势力的阻力，就不可能建立、更不可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所特有的民主制度和民主传统。要民主还是不要民主，要群众路线还是不要群众路线，历来是我们贯彻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反对资产阶级的建军思想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民主传统，就是在不断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作斗争中才确立起来，巩固起来，并且一步步地发展、完备起来的。

三十八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行民主制度、发扬群众路线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靠人民，靠士兵，靠发扬民主，靠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伟大思想的精髓，这是我们军队几十年来由小到大，以弱胜强，打败一个又一个强敌，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传家宝。总结我们在这方面的基本经验，更好地继续保持和发扬这个传家宝，我们就会是无敌于天下的。

在三十八年的历史过程中日益发展和完备起来的部队的民主传统，它的[○]最主要的内容，最基本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如下八个方面。

第一、军队要不要实行民主，绝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根本态度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尊重不尊重群众，相信不相信群众，依靠不依靠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总结工农红军和八路军在这方面的经验时就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这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①。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直到今天，对我们还是十分亲切。他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的指示中，又一次强调了 this 思想。他教导我们，没有坚强的群众观念，没有良好的民主作风，是不够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条件的。事实上，尊重不尊重人民群众，相信不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不依靠人民群众，正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

说这是根本态度，首先因为这是怎样认识和对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第一国际的时候，就明确地规定了一个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② 国际歌里也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个观点于革命战争，明确地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③ “兵民是胜利之本”^④。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几十年的战争史，就是一部人民战争史，一部群众的革命战争史。军队的政治工作，根本的就是教育和发动武装起来的群众的工作。一个革命者，要是离开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士兵群众，就算是三头六臂，也不过是一个孤家寡人，在斗争中是必败无疑的。显然，谁如果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把自己当做英雄、老爷，把人民群众、士兵群众看作阿斗、“群氓”，那他就必然脱离群众，瞧不起群众，不可能平等地对待群众，当然也就害怕民主，不愿意实行民主。

说这是根本态度，还因为这是怎样认识和对待知识的来源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认为，群众是实践者，一切知识无不来源于群众，来源于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

①④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01、498页。

②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89页。

③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页。



实践活动。“必須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①。打仗也是一样。广大的上兵群众和基层指揮員，是战斗第一綫的亲身实践者，真正了解一部分实际情况，因此他們往往能够比較切合实际地設想到每个具体战斗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并且容易找到解决这些問題的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不过是一个加工厂，其任务就是要深入实际，把群众的意見和經驗集中起来，經過加工制造，然后再拿到群众中去贯彻去推广。这就是群众路綫。这样就可以做好工作打好仗。这是我們在几十年战争中反复证明了的一条真理。显然，誰如果不懂得或者不願意看到这一点，不相信群众的智慧，不相信群众的本事，抱着“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那他就根本談不上会有什么民主作风。

說这是根本态度，还因为这是用什么样的階級感情来对待群众的問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們，革命干部必須滿腔热情地对待人民群众和士兵群众，把他們当作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亲近他們，熟識他們，从心底里热爱他們，才能同他們真正打成一片，获得共同的語言，贏得他們的信任。也只有这种出于階級感情上的一致，才能使我軍上上下下紧密地联結在一起，使我軍的民主生活活跃起来、发展起来。对于放下武器的敵軍士兵，也只有把他們当作被压迫、被欺騙的階級兄弟来看待，才有可能真正执行好党的俘虏政策，做好对俘虏兵的团結教育工作。显然，誰如果缺乏这种无产階級的思想感情，那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对士兵、对人民、对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虏的人格尊重，当然也就談不上什么民主作风。

第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把人民軍隊严格的紀律建立在軍隊对于人民的民主关系基础之上，是我軍团結內部、团結人民、瓦解敵軍的强大武器。

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們，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紀律；他們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狹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解放，为着民族的解放，为着人类的解放而結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軍隊唯一的宗旨。

毛泽东同志在我軍初創时期，就手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把无产階級革命軍隊的建军宗旨，在处理軍隊內外关系中最經常遇到的具体問題上体现了出来，把最常見的“小事情”提高到政治原則上来。这样，就在紅軍中彻底破除了旧軍隊欺压人民、虐待俘虏等等的軍閥

^① 《〈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0頁。

* 三大紀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揮；（二）不拿群众一針一錢；（三）一切繳获要归公。八項注意是：（一）說話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調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主义影响，确立了人民军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革命的民主传统，以及争取敌军官兵和宽待俘虏的正确政策。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使人民群众从日常的军民关系中，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完全改变了对军队的旧观念，从怕兵到爱兵，从把当兵的看做“最可怕的人”，变到把当兵的看做“最可爱的人”，从害怕当兵、拒绝当兵，变到争先恐后地抢着参军，从“好男不当兵”，变到“好汉要当兵”。我军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认真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的军队就能够在实际行动中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还创造了瓦解敌军改造俘虏的最大效果。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和我军内部的民主生活，同一切反动军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是最有说服力的活生生的现实。任何反动军队的基层军官和广大士兵，只要一接触这个实际，他们原来所受的反共欺骗宣传就立刻被揭穿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出身的士兵的阶级意识就很快被唤醒了。由于我们的正确政策和民主主义的影响，以及对俘虏的教育工作，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曾经使成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掉转枪口打蒋介石，并且在这些解放战士中出现了许多战斗英雄，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也曾经促使成批的敌军放下武器，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训练出来的敌军官兵反过来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力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共只有六十一个字。讲的又多是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这样一些极平常、极普通的事情。这在那些满脑子旧军队思想的人看来，固然根本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在那些满脑子洋教条的人看来，这种“从山沟沟里出来的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就是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規定里，却真正闪烁着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却真正把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思想具体化了。有些人把这六十一个字看得很简单，以为做起来还不容易？其实，他们那里懂得，没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一个彻底革命的世界观，还硬是做不到呢！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军队，任何一个没有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军队，都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

第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开展广泛的政治民主，是全部民主生活、民主运动的前提和基础。

我军的民主运动，历来是从建立官长和士兵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民主关系做起的。这种平等地位和民主关系，就表现在我军官兵只有职务上的区分，没有人格上的贵贱，大家都是阶级兄弟，都是来干革命的，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的宗旨。为了革命的利益，人人都有学习研究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权利，都有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提出积极建



議的權利，都有同違反黨的方針政策的思想行為作鬥爭的權利。為了人民的利益，幹部戰士可以互相監督，互相批評。幹部只有為了工作多費腦筋、多出主意、多負責任的義務，而沒有任何特權，對於士兵群眾的正當批評，只有歡迎的義務，絕無拒絕的權利，更不允許壓制和打擊報復。這樣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群眾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才能使大家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發揮對於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才能達到提高廣大指戰員的積極性，增強軍隊的戰鬥力的目的。

提高廣大官兵的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是實現三大民主的思想基礎。毛澤東同志早在一九二九年為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就強調以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從教育上提高政治水平，充分發揚民主，建立正確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生活，來反對和糾正一切不良傾向。他在總結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式整軍運動的經驗時更進一步指出：“由於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強的團結。在這個基礎上，部队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群眾性的練兵運動開展了，完全有領導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的民主發揚了。”^①三大民主必須也只能建立在以階級教育為核心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政治民主的基礎之上，在這裡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經驗一再證明，離開了階級教育和政治民主的這個基礎，整個民主生活是不可能健全開展的。試想，假如在官兵之間沒有政治上的共同目標，沒有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共同的階級感情，經濟民主、軍事民主又怎麼能夠搞得起來呢？還能談得上什麼士兵參加管理伙食、監督經濟開支？還能談得到什麼在訓練中實行官兵互教、評教評學？至於打仗時民主討論作戰方案，提困難想辦法，打完仗評指揮評戰術等等，就更不用說了。

我們的政治民主，是由我軍的階級本質決定的。我軍內部沒有階級的對抗，官兵都是階級兄弟。而一切反革命軍隊反動的階級性質，決定了它們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更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軍隊所獨有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和戰略戰術。請看，蔣介石過去不是早就十分認真地研究過我們的十大軍事原則嗎？不是早就下令採取過我們的立功運動的辦法嗎？去年以來，不是又在研究和“推行”我們的郭興福教學法嗎？美帝國主義不是也早就在研究我們的游擊戰術嗎？在越南南方的美國軍事顧問團不是也在反復提倡要學習我們的“三大紀律、

^① 《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2頁。



八項注意”嗎？但是，所有这一切，又帮了他們什么忙呢？

軍事离不开政治。无产阶级的軍事只能产生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尽管我們的这一套完全公开，毫不保密，尽管蔣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可以对这些材料加以充分的研究，但是他們却永远不可能理解其精髓，更不可能运用到他們的部队中去。这是他們军队的反动阶级本质决定的。因此，他們企图从这里找到一种窍门，来提高他們的士气与战斗力，实际上只能一次次地可怜地落空，一次次地成为人們的笑柄！

第四、实行經濟民主，关心士兵生活，官兵同甘共苦，是官兵一致这个政治原則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团结群众发挥群众积极性的起点。

在一切旧军队中，士兵不但在政治上受压迫，而且在經濟上也受剝削。尅扣軍餉，“喝兵血”，是旧军队普遍的现象、公开的秘密。在我軍初創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确立官兵一致、废除打罵制度的同时，就确立了实行經濟公开、士兵管理伙食等經濟民主的原則，并且历来十分重視士兵生活的改善，历来強調官兵同甘共苦的重要，历来反对一切不爱护士兵、不关心士兵的官僚主义倾向。早在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就強調地指出了这种和政治民主相结合的經濟民主，对于当时艰苦奋战的幼年紅軍的重要意义。他写道：“紅軍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維持不敵，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內的民主主义。”^①几十年来，这些传统，一直在团结自己，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一些沾染了旧军队軍閥主义和官僚主义习气的人，是不願意也不屑于去搞經濟民主这样的“小事情”的。在他們看来，什么經濟公开，什么改善伙食，还不是鸡毛蒜皮？他們根本不懂得，只有关心群众才能团结群众、领导群众。毛泽东同志曾經反复地闡明过这一点。他說，“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战綫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謀利益……”^②。只要我們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們，把革命当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們无上光荣的旗帜。”^③ 我軍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和平建設时期，都始終坚持了干部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的传统，这就保证了我軍官兵之間充滿了阶级感情、阶级友爱，大家都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忘我地奋斗。

实行經濟民主，关心群众生活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士兵群众往往是从直接关系自己切身

^① 《井崗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頁。

^{②③}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133—134頁。



利益的一些“生活小事”上，最具体、最实际地体会到革命军队的本质，体会到为谁革命为谁打仗等等革命的大道理。一个领导干部尽管道理讲得再好，如果自己在生活上特殊化，不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疾苦，在士兵眼里就不过是革命的空谈家，不过是站在群众头上的官僚。这样的官僚主义者去带兵打仗，是很难不跌跤子的。

第五、实行军事民主，是提高战术技术，打胜仗，出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开“诸葛亮会”提困难想办法，是实行军事民主的基本方法。

我军的经验早就证明，革命军队不但可以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而且可以实行军事民主，不但平时训练可以实行军事民主，而且打仗也可以实行军事民主。远在工农红军时代，这种军事民主就已经有了。红军打仗前要进行战斗动员，打仗后要开会做战斗检查和战斗总结，这实际上就是军事民主。年轻的红军，所以能够很快就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所以能够很快就从农民出身的士兵中、从没有进过任何军事学校的“土包子”里，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来，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以外，实行军事民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红军时代的这种军事民主，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跃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练兵到作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民主的方法。在训练中实行官兵互教，教学相长，评教评学；组织练兵互助组，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取长补短，开展互教互学、包教保学活动。在作战中，只要条件许可，就发动干部和战士讨论战斗任务和作战方案，出主意，想办法，解决技术、战术上的困难；战后就组织“战斗评论”，评勇敢、评技术、评战术、评纪律、评指挥，总结实战经验，打一仗进一步。这样，在练兵和作战中碰到的各种难题，一经发动群众大搞军事民主，无不迎刃而解。在整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实行军事民主，对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战胜美帝国主义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军队，起了极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及时总结了这种进一步发展了的军事民主的经验。他指出：“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①实行这种军事民主，就能够集中群众智慧，激励士气，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使军事民主在全军得到了更加广泛更加自觉的开展。部队越打越有办法，士兵越打越聪明，干部越打越能干。许多外国人乃至一些中国人，总是不能懂得解放

^①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5页。



軍的手榴彈怎么会制服了坦克？木船为什么会打败了軍艦？沒有大炮，怎么会炸开了坚固的城牆和鋼骨水泥的碉堡？如此等等，一連串的解不开的“謎”。其实，这一切奇迹之所以能够創造出来，除了靠我們部队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勇敢精神而外，主要的就是靠了个“大家想办法，人人出主意”的軍事民主。这就是我們的“秘密”。

第六、軍队的民主运动，应当达到巩固紀律和增强战斗力的目的。既放手发动群众，又加强集中指导，是正确开展民主运动的關鍵。

軍队中的民主，应当是为着巩固紀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紀律和战斗力。事实上，凡是正确地、有领导地开展了三大民主的地方，也都获得了这样的效果。經驗证明，一切担心民主开展起来，特别是軍事民主开展起来，会削弱紀律呀，会妨碍指揮呀，会影响干部的威信呀，会耽擱時間貽誤战机呀，等等的顾虑，都是毫无根据的。

打仗，是敌我之間的生死搏斗，最需要統一的行动，最需要严格的紀律，最需要权威的指揮，最需要当机立断。一句話，就是要高度的集中。既然要高度的集中，又怎么能够开展广泛的民主呢？的确，这在資產階級軍事家來說，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在反动的軍队里，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但是在我們的軍队里，却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在革命軍队中实行軍事民主，不但和打仗的这一切要求并不冲突，相反，民主的开展，正是加强了这一切。

經驗证明，民主开展得越是充分，上下級之間、官兵之間就越是能够增强互相的了解与信賴，消除彼此的顾虑与怀疑，领导正确、有錯即改的指揮員的威信就越是得到巩固，他就越加能够放手指揮，而下級和士兵也越加能够自觉地遵守紀律、执行命令听指揮。同时，越是民主地討論和修訂了作战方案，使每个成員都清楚地了解自己在整个战斗中所占的地位与应起的作用，就越加能够提高他們的作战积极性，就越加能够加强他們在战斗中自觉的团結与协同。也正因为經過战前的軍事民主，参战人員对作战方案都有了一定范围的了解，战斗中即使在指揮員甚至預定的代理人連續伤亡的情况下，也才不至于使指揮中断，在党团员挺身而出繼續指揮的时候，也就不仅有了政治責任心的保证，而且有了具体办法上的保证。民主究竟是妨碍集中，还是加强集中，难道还不清楚嗎？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完全能够說明这一点。我們的干部战士在要安排或者执行什么任务的时候，总是要“商量商量”、“酝酿酝酿”、“征求征求意见”；在发生了不同意見的时候，又总是采取把不同意見“摆一摆”、“議一議”，对持有錯誤意見的人“打通打通思想”、“做做說服工作”；在做完一件事之后又总是要“提提意見”、“检查检查”、“总结总结”。所有这一切，从总体上說来，都不仅沒有引起什么麻煩，耽誤什么事情，增加什么分歧，相反，这一切正是使我們上上下下更好地增进了解，加强团結，集中意志，統一行动，更好地完成



了每一个任务。

对民主运动抱着无穷的忧虑，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或者给民主运动加上种种清规戒律，当然是错误的。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缺乏民主作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光是走民主的过场，实际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也是错误的。但是假如认为只要开展了民主运动，干部的责任便减轻了，一切只要按大家的意见照办就是，放弃必要的领导和集中，充当群众的尾巴，那也同样是错误的。应当说，这不是什么民主，而是对民主的十足的歪曲。照此办理，只能把事情办坏，把仗打坏，只能助长歪风邪气，挫伤群众正当的积极性。

那么，怎样才能对开展三大民主实行正确的领导呢？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已经根据红军当时的经验，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以明确的回答。他指出，为了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①。显然，那种认为既然要讲民主，领导上就可以不负责任，可以毫无主见，可以随波逐流，可以不分析群众中的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不区别可以行得通的和暂时还行不通的意见，只要跟着群众跑就行了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为了有领导地开展民主，遇事能有正确的主见，能拿出切实的办法，就必须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可见，要正确开展民主运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除了必须具备坚强的群众观念，正确的民主态度之外，还必须具备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领导艺术，而不是相反。

几十年来，我军的三大民主从形式到内容虽然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有领导地实行民主的基本经验、基本方法，却仍然离不开毛泽东同志所概括过的这一些。经验证明，凡是按照这些规定去做的，凡是自己首先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心中有数，又引导群众都来重视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的，民主就一定能够得到健全的开展，无论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无论是提困难想办法，也都都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收到最好的效果。

第七、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在军队内部贯彻民主制度、实行群众路线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同志在建军之初，就为建立、健全和巩固军队中的党委制而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并在以后的实践中使党委制日臻完善，逐渐发展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一切重大问题，除了在紧急情况下，由首长机断处置以外，都必须由党委会讨论决定。在讨

^①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1页。



論問題時，要充分發揚民主，允許不同意見的爭論，力求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作出決定。經驗證明，這個制度，既能廣泛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集中群眾的經驗與智慧，防止個人包辦、個人決定重大問題，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又能充分發揮首長個人的作用，在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之下機斷專行地行使首長的職權，獨立負責地完成任务。這是一個經過考驗的、最為優越的根本領導制度。

我軍幾十年的歷史證明，任何部隊任何時候，破壞了或者削弱了黨委制，就必然發展個人專權的軍閥主義傾向，就必然破壞軍隊黨內的民主生活和黨對部隊的領導，就必然瓦解部隊內部的團結和統一，就必然削弱部隊的戰鬥力。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時期，取消了紅軍中的黨委制，對當時紅軍的作戰和建設造成了很大的惡果。而在抗日戰爭時期以軍政委員會的形式實際上恢復了黨委制以後，特別是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完全恢復並且進一步健全了軍隊中的各級黨委制以後，就大大增強了全軍在黨的領導下的團結，大大活躍了部隊內部的民主生活，有領導有秩序地開展了民主運動和新式整軍運動，從而極大地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保證了戰爭的最後勝利。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黨對軍隊的領導，應該是各級黨委統一的集體的領導，決不應該是任何黨員、首長的個人專權。在中央統一領導之下建立軍隊各級的黨委制，在黨委內部實行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就是這樣一種把兵權置於黨的領導之下的根本制度。同時，也只有按照這個制度首先在領導成員中建立起優良的民主作風，才能搞好部隊的民主生活。因此，堅持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就成為在軍隊內部貫徹民主制度，實行群眾路線，防止任何個人專權的軍閥主義傾向的根本保證。

第八、在“小米加步槍”的條件下，需要實行三大民主，有了現代化裝備，進行現代化戰爭，仍然需要、更加需要也完全能夠實行三大民主。

三大民主產生於我軍“小米加步槍”的時期，這使一些抱有資產階級軍事觀點的人找到了一種“理由”，似乎什麼三大民主呀，群眾路線呀，都不過是由於我軍裝備處於劣勢、我軍軍官缺乏軍事素養而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之計，都不過是一些“土辦法”。在他們看來，這些“土辦法”，是很低級的，是不科學的。一有現代化裝備，一搞正規化訓練，一打現代化戰爭，這些“土辦法”就完全不中用了，就只能依靠經過所謂科班出身的指揮員和技術專家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新的歷史時期，個別死抱著資產階級軍事思想不放的人，在一個短時間內曾經再一次跑出來興風作浪。他們借着建設現代化正規化軍隊的名義，主張取消軍隊中的黨委制，實質上即是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削弱政治工作，否定我軍的民主傳統和群眾路線，妄圖把人民解放軍拉到資產階級的建軍道路上去。要不要繼續保持和發揚我軍的民主傳



統和群眾路綫，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两条軍事路綫斗争的一个重要內容。

十五年来的事实，完全粉碎了这种荒謬的論調。朝鮮战争可以算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規模最大的一次現代化战争吧！中国人民志願軍和英雄的朝鮮人民軍一起，战胜了具有强大的海、空、炮优势的美国侵略軍，并不是因为我們当时拥有比美国更現代化的軍事装备和軍事技术，主要地是因为我們战争的正义性，是因为我們有朝中人民的全力支持，是因为我們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針，是因为我們广大指战員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勇敢精神，而很好地发揚了民主传统和群眾路綫，是其中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举世聞名的被称为地下长城的坑道工事和坑道攻守战术，在敌机連續轰炸下保持暢通的鋼铁运输綫，把美国飞机的“空中优势”打成“空中劣势”的群众性对空射击运动，使美国兵在三八綫上坐立不安的狙击战等等，难道不都是广泛发揚民主，依靠群众、依靠广大干部战士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創造出来的嗎？

說什么現代化装备，科学得很，复杂得很，士兵群众不懂得，因此根本不能搞民主，这种說法如果不是迷信和无知，就是存心唬人，完全是一种騙局。空軍、海軍的技术装备，可算得現代化吧！原子弹、导弹等新式尖端武器的研究、試驗和制造，可算得是高度現代化了吧！但是，我們年輕的空軍和海軍是怎样迅速地掌握了現代化技术的呢？我們年輕的工农出身的駕駛員，是怎样打掉了美国的王牌飛行員的呢？近年来我們的防空部队又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打掉了美蔣各种型号的間諜飞机的呢？难道不正是在很大程度上靠了大家出主意、大家想办法的民主运动，靠了领导和群众相結合的这个传家宝嗎？我們的国防工业又是怎样打破资产阶级的常規，克服現代修正主义者給我們造成的种种困难，在极短的时间內成功地爆炸了我国自己設計自己制造的两顆原子弹的呢？难道不正是在很大的程度上靠了大家出主意、大家想办法的民主运动，靠了领导、专家、工人三結合的群众路綫这个传家宝嗎？

一切經驗都证明，技术装备越是現代化，越是使用現代化装备进行战争，越是对付具有現代化装备的敌人，我軍的民主传统和群眾路綫的工作方法，就越是不能削弱，相反，倒是更加需要加以坚持和发揚。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发明武器的是人，制造武器的是人，使用武器的是人。消灭武器的还是人。沒有人，不但任何現代化的技术装备都不过是一堆死东西，而且就根本生产不出来。人的能动性是任何先进的技术装备都不能代替的，人的因素永远第一。而在人的因素中，任何首长和技术专家的个人智慧和個人經驗，总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此，只有在党委集体领导下，充分发揚民主，充分發揮群众的集体智慧，充分調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現代技术装备的作用，才能确有把握地胜利地进行极其复杂的現代化战争。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这方面仍然是我們最好的反面教員。他們对于我軍在革命胜利以后



一度出现的资产阶级建军思想十分欣赏，高兴得不得了。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人民解放军尽管在技术装备上比过去加强了，但是它的革命传统，例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以三大民主为核心的群众路线等等，就会被削弱甚至被抛弃了，这支革命队伍就会变质，就会变成同资产阶级军队一样的“职业军队”，因而就比较容易对付，就有可能被打败了。但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高兴得太早了，事实很快就使他们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胜利以后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党中央、毛主席、军委和林彪同志领导下，不但坚持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包括三大民主在内的、由毛泽东同志手创的我军革命传统这件事，引起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之流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极大恐惧和仇视。他们大肆诬蔑我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运动，说什么这就是要取消民主，要人民毫无怨言地服从啦；说什么这就是要中国人民进一步牺牲个人利益啦；说什么这就是要把军队的组织和方法强加于工厂和公社，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一座兵营啦；如此等等。他们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这样起劲地攻击和诬蔑我们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感觉到，我们坚持和发展这种传统，对于他们是极为不利的。他们那种以为我们有朝一日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装备的改善，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丢掉自己的老传统、逐渐脱离群众的妄想，就完全落空了。

这丝毫也不奇怪。他们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了解这样一事实：中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根本内容，恰恰就是要学习解放军是怎样坚持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同时也就是要学习怎样坚持、发扬我党的民主传统。大家知道，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①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它的种种优良的传统，常常首先在军队中得到贯彻，这正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长期革命战争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我们党的民主作风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也是这样。在几十年的战争过程中，整个解放军就是一所民主的学校，一个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播种机。在同国内外反动派艰苦战斗的年代里，解放军到哪里，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哪里，民主思想民主作风就传播到那里；那里的人民就学会了开会、选举、讨论、批评等等运用民主的方法，就懂得了怎样使用民主的权利和怎样在民主基础上达到意志的集中和行动的统。至今，中国人民总是把那些最具有民主作风，最能够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干部，亲热地称为“我们的老红军”、“老八路”，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

我们军队一切制度和优良传统的树立，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的领导为前提的，是以全心全意为保卫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前提的。军队的一切任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1页。



务，都是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实现的。我们的人民向军队学习，我们的军队向人民、向地方工作学习，军民是一家，军队地方是一家。这种情况，对于那些脱离人民、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为敌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来说，又怎么可以理解呢？他们是不愿意也永远不可能理解这一点的。在他们看来，绝对服从，没有民主，是一切军队的共同特点，不管是资产阶级军队还是无产阶级军队都一样。因此，中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当然就是要取消民主，当然就是意味着要对人民进行军事控制。这就是他们的可怜而又可笑的逻辑。他们的这种攻击和诬蔑，除了暴露出他们的极端无知，暴露出他们对一切革命事业的极端仇恨而外，又能有什么作用呢？这不但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而且恰恰是给我们充当了最好的反面教员，证明了我們这样做是做对了而不是做错了。这又一次说明了一个真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害怕的，并不是你的现代技术。现代技术，你有他也有，他的现代技术，甚至还比你多，比你好。他们对这一方面并不害怕，他们真正害怕的，恰恰是我们所独有的广大指战员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恰恰是能够把这种政治觉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的群众路线，恰恰是我们的民主传统。这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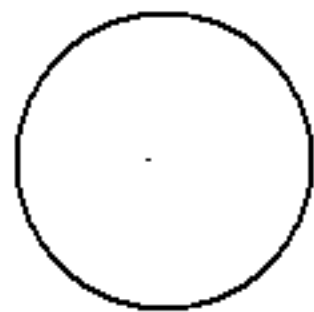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军事工作也应当实行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军队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开展三大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的新发展。它既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中产生的，是在战争中、在军队中首先推行起来的，又是同样适用于一切人民革命事业的。我国人民在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的比学赶帮运动中，把我军的民主传统具体运用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广泛地开展了政治、生产、财务和军事的四大民主运动，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得到了提高觉悟、推动生产、发展科学的巨大效果。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同志手创的我军民主传统，是我们的革命传家宝，是用到那里那里灵，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军队和广大人民，在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政策时，依靠这个革命的传家宝，赢得了历次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后，继续依靠这个革命的传家宝，把它在全国各个战线进一步运用发扬起来，我国人民就一定可以更快地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我们人民解放军应当更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续保持和发扬我军的民主传统，虚心地向地方上在这方面的一切新成就，新经验，为进一步提高我军的战斗力，更出色地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的南针

——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



陶 铸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到现在整整十年了。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不论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都已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无古人的速度向前推进，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全党高举了毛泽东思想旗帜，特别是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的解决农业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适时地解决了我国的农业合作化问题，接着又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解决农业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题。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不仅为农业大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又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极为牢固的基础。回顾十年来的历史事实，环视当前农村和城市的大好形势，展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前景，人们更加坚信，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原是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在这样的国家里，迅速地把五亿多个体农民组织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来，走上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件。

我国十年来的实践，无情地驳倒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关于农业问题的谬论，彻底粉碎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恶毒攻击。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所作的理论概括，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和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曾经说过：“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①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农业集体化是一个伟大的深刻的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的整个过程，贯串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況下出现的”^②。事情正是这样，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出世，不经过阶级大搏斗是不可能的。这个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合作化运动。全党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篇著作，就是对这个斗争所作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紧接着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所有制，推翻了地主阶级，削弱了富农经济，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广大贫农群众的经济地位有了改善，很多贫农上升为中农。但是，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中存在的是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的生命力毕竟是有限的，不用多久的时间，它就从生产力的推进者变为严重的障碍。同时，因我国人口众多，已耕地不足，农业经营方法又很落后，所以农民在分得土地以后，虽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仍然有困难，或者不富裕。特别严重的是，土地改革以后不久，农村中又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现象：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另一方面，许多贫农因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又将分得的土地出卖了或者出租。如果让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发展下去，农村中必将出现资本主义泛滥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党是领导农民继续前进，把他们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停步不前，抛开农民，让他们跟资产阶级和富农走呢？这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课题。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告诉全党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坚决领导农民继续前进，必须相信群众，必须相信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在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页。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6页。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中指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貧农和新老下中农，他們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特别是他們中間觉悟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而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国农村中出現的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高潮，就是广大貧农下中农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集中表现。

但是，资产阶级和富农却坚决反对合作化运动。大約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的或比較富裕的农民，他們对社会主义是动摇的，有些人还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富裕中农的后面，还有地主和富农的支持。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总是要反映到党内来的。资产阶级、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为了抵抗社会主义改造，他們必然要从共产党内部寻找他們的代言人。果然，他們找到了这样的代言人，这就是当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場上，处心积虑地寻找种种借口，反对党所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右倾机会主义者被我国农村涌现出来的几十万个合作社吓昏了头脑，他們借口所謂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經驗水平”，反对当时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們对蓬勃发展着的合作化运动，不是热情支持，而是泼冷水，提出所謂“坚决收縮”的方針。对于这种人，毛泽东同志曾經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們，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①可見，对待农民的合作化运动，究竟是发展还是“砍掉”，是奋勇前进还是“坚决收縮”，是热情领导还是指手划脚，归根到底，这是如何对待五亿多农民，特别是广大貧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問題，是要不要积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問題。

一九五五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空前高涨的伟大一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右倾机会主义者出来声嘶力竭地反对合作化呢？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說的，“他們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場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他們“看見了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記了最大量的貧农和非富裕农民”^②。我們知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资产阶级是一場生死存亡的斗争。我們把个体的小农經濟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經濟，就挖掉了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老根，并且使城市资产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有些人在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影响下，出来反对合作化运动，就不足为怪了，就是完全符合阶级斗争規律的了。这些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对待农民問題上，仍然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87頁。

②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25、19頁。



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这说明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洞察了事物的本质，预见事物发展的方向，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关头，再一次向全党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及时地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积极领导合作化运动。

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出现，大大地加快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设想，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即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一九六七年止完成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全国各地都提前完成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即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致在一九五六年就基本完成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致在一九五七年就完成了。一九五八年，全国农村又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就是说，我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包括实现人民公社化，总共只花了九年的时间，比原计划正好提前一半。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使农村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底描绘过这个变化。他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①

实际生活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十年来，在农业问题上的斗争还是时起时伏的。在这十年间曾经发生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复。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一九六二年，在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情况下，又有人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单干风”、“自由化”，等等。尽管右倾机会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还是一样。所以，坚持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像一根红绳一样，贯穿着过去的整个十年。尽管在某些时候，由于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领会不深，在实际工作中曾经发生过某些步子过急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右倾机会主义。正因为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才把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使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个伟大著作，是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引导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南针。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29—730页。



二

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解决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国，农民问题在中国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党领导农民进行了民主革命，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民问题上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这种丰富的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概括，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我们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问题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农民问题。早在我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初期，他就不止一次地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可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把广大农民放在眼里，认为民主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从另一个方面忽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他们强调城市工作是中心，并把中间力量作为主要打击方向，硬要把农民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彻底批判了这些错误的观点，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充分地发扬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把党的工作重点移到农村，放手发展农民游击战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使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终于在六亿多人口的中国取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仍然把农民问题放在极端重要的地位。他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and 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①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就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方针来解决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链条中的主要环节。因为对农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就割断了资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系，消灭了大量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使城市资本主义势力处于孤立的地位。这一点，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特别显得突出。毛泽东同志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否定了那种认为合作化只能慢慢来的主张，而强调必须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这样做，不但可以较快地解决农业本身的问题，而且可以极大地推动城市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更加顺利、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个方针的正确性。一九五六年个体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正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怎样处理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有人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只要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工业这一点上就足够了。毛泽东同志驳斥了这种有害的观点。他说：“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①工业和农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内部联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发展工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首先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粮食和其他食品来自农业；为人民提供穿、用物品的轻工业，其原料也多数来自农业。同时，建立重工业的资金，主要由农业和轻工业来积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要由农村来提供；而且只有以农村为主要市场，工业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只有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把迅速发展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有了稳固而可靠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总结我国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并在制订计划时按农、轻、重的次序进行安排。执行这样的方针，就可以使农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实现农业和工业同时并举，把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建立在强大的农业基础上，实现整个国民经济持久的、高速度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伟大成就，正是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导下取得的。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这个方针，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新的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以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原理指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贯以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指导我国的革命运动，包括农民运动。他指出，我们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不仅为了实现民主主义的任务，而且为了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性质上不同的、要由革命的两个阶段来分别解决的任务。但是，我们绝不能在革命的两个阶段之间筑起一座万里长城，而必须把两个阶段紧密地衔接起来。在前一阶段要尽可能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前一阶段的任务一旦完成，就应当不停顿地立即开展下一阶段的斗争。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23—24页。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原理，把革命的两个阶段截然对立起来。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主张在农村实行雇工、信贷、贸易、土地买卖和出租的“四大自由”，确保私有财产，巩固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些同志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希望中国革命在民主主义阶段停顿下来。

毛泽东同志彻底批判了这种观点。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树立贫农的优势；在彻底消灭地主封建经济的同时，必须在政治上孤立富农，在经济上削弱富农经济；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后，必须积极地组织农民，建立包含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和合作社。所有这些，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当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不应该让革命停顿下来，让群众革命热情冷却下来，而必须不断提高农民的革命觉悟，把土地改革同农业合作化紧密衔接起来，不停顿地引导农民继续前进，由个体经济转向集体经济。

毛泽东同志为我国农业集体化所拟定的各种完善的逐步过渡的农业组织形式，是创造性地运用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原理的又一个光辉范例。在合作化过程中，我们通过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采取了三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步骤：第一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号召农民组织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在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又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领导农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我们这样一步一步地改造小农经济，既有利于逐步启发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较快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又避免了因生产关系变革的剧烈震动而可能引起的对生产的消极影响，保证了农业生产逐年上升。

在农村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就宣告结束了呢？有些人以为，是结束了。在他们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革命，至少是最后一次带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种见解，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固然是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次伟大变革，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远没有最后完成。

事情很清楚，只要农村还存在着私有经济的残余，农民就仍然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某些固有的特点，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也就难以完全避免。而且，从长远来看，仅仅实现目前这样的农业集体所有制，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将来，我们还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逐步地把规模较小、公有化程度较低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规模较大、公有化程度较高的集体所有制，以至最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本质差别。很显然，



要实现这样的历史任务，就必须以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思想，继续把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地向前推进。

三、关于正确处理农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问题

正确处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正确处理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在农业生产几乎没有或者很少使用机器，而国家工业又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能不能实现农业合作化呢？有些同志曾经认为，在沒有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要想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些同志，看不见农村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看不见个体农业经济已经不再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死抱住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关系不放，这就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理论。这些同志，有的是由于一时沒有弄清楚事情，当他们把事情弄清楚以后，就拥护党的农业合作化方针。但是，也有少数同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错误观点。

同上述的错误观点完全相反，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①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领导下，在农村先进行合作化，再实现机械化，或者说，在一个时期内以社会改革为主，以技术改革为辅，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国工业比较落后，这是一个事实，可是正因为工业比较落后，就必须首先实现农业合作化。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能够为农业的技术改革开辟广阔的道路，也只有农业生产迅速提高了，才能够促进重工业的发展，更快地为农业提供大量的机器设备。因此，在当时必须毫不迟疑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劳动，集体经营。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制止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即使仍然使用原来的生产工具，也能够创造出比个体生产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加速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合作化和机械化的关系，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理论。早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然是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出现的，但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又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人们看得很清楚，正是由于我们及时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改变了农村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充分地发扬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扬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仍然是又相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23页。



适应，又相矛盾的。“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①正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以前有许多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已经不再有矛盾。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辩证法就不适用了，矛盾的运动就终止了，社会的发展也就停顿下来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只会使自己在现实的矛盾面前处于被动的地位，对于我们变革世界的实践是十分有害的，因而是极为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仍然存在着矛盾的论点，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使我们能够自觉地主动地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地完善和革新生产关系，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四、关于农村阶级斗争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问题

毛泽东同志从一九四九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就不断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和革命的观点武装全党的同志，要我们牢记整个过渡时期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在土地改革以后，是听任资本主义滋长和泛滥呢，还是前进到社会主义呢？在合作化以后，是继续不断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满足于已有的一切，半途停顿下来，甚至向资本主义倒退呢？这就是整个过渡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力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粉碎阶级敌人的“和平演变”阴谋。

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了我国农村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并且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我国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各阶级、各阶层，作出了创造性的科学分析，使我们能够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在农业合作化大规模展开的时期，我国农村中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变为新中农，中农（包括新老中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显著增加。毛泽东同志对中农的各个不同阶层进行了具体的阶级分析，这是关系到如何制定社会主义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重要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者从农村日益中农化这一事实出发，认为不应当再提依靠贫农的口号。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他指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2页。



大的貧农群众，才能比較順利地办到，否則將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階級，是比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資料的制度，比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們。他們中間的大部分現在已經变为新中农，但是他們同老中农比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較高的觉悟，他們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間的下中农，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間的下中农比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間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①

富裕中农虽然大多数对于合作化是可以贊同的，但他們有着較多的資本主义傾向，常常企图走資本主义的老路。同他們的資本主义傾向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中国富农經濟很弱，而富裕中农的力量却相当大，所以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往往表现为同那些受到地主和富农支持的富裕中农的斗争。

根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在农村必須依靠貧农和下中农的口号。在我国，貧农和下中农約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有这样广大的劳动农民作为工人階級在农村的依靠，我們农村的集体經濟就找到了可靠的力量，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就有了强大的社会支柱，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的胜利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对农村各階級、各阶层的分析，为工人階級解决了如何对待中农这样一个重要的策略問題，为我們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制定了一条依靠貧农和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階級路綫。

五、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問題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联盟的基础、内容和所采取的形式究竟怎样，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問題。毛泽东同志說：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階級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階級的联盟”^②。問題在于，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农联盟應該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这个联盟應該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巩固。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加强工农联盟的过程，就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农民、按社会主义原則改造农业的过程，就是在农村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就是使工业和农业密切結合、并使工农差別和城乡差別日益縮小的过程。但是，在不同的时期，还必须根据工农关系中出現的問題，及时地具体地加以解决，才能不断地巩固工农联盟。

当农民的个体經濟同整个国民經濟的发展已經不再适应的时候，实行合作化就成了巩固工农联盟的中心問題。毛泽东同志坚决駁斥了那种认为如果合作化不赶快“下馬”，就有破坏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 858 頁。

②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483 頁。



工农联盟的危險的机会主义論調，他說：“我們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險。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馬，一个要上馬，却是表現了两条路綫的分歧。大家知道，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給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經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經消灭了。”現在只有在新的基础上工农联盟才能够繼續巩固下去。“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們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們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險。”^①

当然，为着巩固工农联盟，只是解决个体农业經濟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間的矛盾，还是不够的。在合作化以后，还必须正确地处理集体經濟內部的各种矛盾（如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費、领导与群众等等），以及集体經濟与集体經濟之間的矛盾；正确地处理农业的集体所有制与工业的全民所有制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农业技术落后与工业技术相对先进的矛盾，等等。

在整个过渡时期，农村中始終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站在最广大的劳动农民方面，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势力，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最重要的保证。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綱，抓紧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工农联盟才能够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六、关于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問題

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把他們当作历史的主人，还是把他們当作一群浑浑噩噩的“群氓”，这从来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历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我們党所领导的任何伟大的革命运动，必须是伟大的群众运动，这个革命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結果，不能是政府或者别的什么人的施舍和恩賜。同时，在毛泽东同志看来，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时候都要满腔热情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任何时候都不能向群众头上泼冷水。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經指出，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面前，“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决定取舍。站在他們的前头领导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評他們呢？还是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第30—31、32頁。

^② 《論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頁。



站在他們的对面反对他們呢？”^①那时，毛泽东同志坚决地反对把群众运动看成“糟得很”，而热烈地歌颂群众运动是“好得很”。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毛泽东同志一贯地用最高的热情对待群众的革命斗争，领导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在我国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在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方面再一次为全党作出了榜样。他反复指出，农业集体化是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这是五亿多农民的伟大事业，是誰也无法恩赐和包办代替得了的。“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②。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对革命人民的高度信任的表现。

在如何对待革命群众运动这一个最基本的問題上，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违反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他們对五亿多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抱着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不相信广大农民願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不相信广大农民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排除一切困难，办好合作社，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陣地。所以，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到来时，他們就吓昏了头脑，惊慌失措，害怕得要死，甚至胡乱地“砍掉”已經組織起来的合作社。他們重复了“叶公好龙”的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我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所出現的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又一次說明了，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始終是我們工人阶级政党应当注意的一个根本問題，就是在取得了政权以后，我們同样不能对此有絲毫的忽視。絕不可以认为，有了政权，就可以用行政命令来代替群众的革命斗争，就可以不尊重群众的革命創造性，不爱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用諸如“砍掉”合作社这样的錯誤行为来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要知道，我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正是为了运用它更好地放手发动群众，調动千百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彻底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最后消灭阶级；为了动員和組織亿万劳动群众的力量，發揮他們的聪明才智，最有力地战胜大自然，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如果我們不运用政权的有利条件，更坚决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帶領群众前进，而把政权变成脱离群众、束縛群众手脚的官僚主义机构，我們就将一事无成，甚至招致革命的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屁股坐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傾向的富裕中农的一边，他們听不到也不願意听五亿多农民的呼声，不願意細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經驗，这样他們就远远落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后头，成了障碍群众前进的絆脚石。

毛泽东同志又經常教育全党，要保证革命群众运动健康发展，不能坐着等待群众起来，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14頁。

②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第2、1、2、34頁。



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依据每一阶段的革命目标，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充分教育和发动群众，使之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斗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就教导我们，必须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认真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了曾经成为合作化的严重阻力的“小脚女人”的爬行思想，放手发动广大贫农下中农群众，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迅速地掀起了伟大的革命浪潮，奔腾澎湃，势不可挡。同时，正是由于我国的农业集体化是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产物，是群众用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得来的，而不是由旁人所恩赐的，所以它是经得起任何风浪考验的，雷打不散的。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所作的贡献是极为伟大的。中国五亿多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实践，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这是一条解决农业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受到了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热烈赞扬，它为一切争取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人民提供了范例，在国际上日益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却竭力攻击我们解决农业问题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是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所奉行的乃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不论是赫鲁晓夫本人或者是其衣钵的继承者，他们都是挖空心思地在农业中推行资本主义的方针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一个取得了政权、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不断地进行如列宁所说的“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①的工作，以创造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倒行逆施，背弃了由列宁所确定的农村工作路线，在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上实行倒退，千方百计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苏联人民的意志，必将遭到彻底破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妄图抹煞我国农业集体化的伟大成就，除了更加暴露出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目以外，绝不会有别的什么结果。

三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年来，我国农村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积极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还是安于小农经济现状——早已解决了。农业集体化的迅速实现，几千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

^①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页。



所有制所代替，这是我国农村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发生的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飞跃。这次革命飞跃，对于推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极为巨大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在我国农村的胜利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极为坚固的基础。当前，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都是一片大好形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正在继续胜利前进。无数的事实充分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无比优越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坚信，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使我国在经济、文化、科学、国防各方面迎头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了使我国的农业能够获得更迅速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现在摆在我们农村工作面前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系统地解决农业集体化巩固和发展中的新问题，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更迅速的发展，使我国农村又一次出现新的面貌。

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国内外的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由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作用，在我国农村中（城市也一样），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严重的、尖锐的。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阴谋复辟，有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也向社会主义阵地实行猖狂进攻。同时，我们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还不很适应新的经济基础；我们农村中在集体化后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在有些方面也还不够完善。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利于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不利于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的更迅速发展。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为了集中地着重地解决这些问题。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农村中进行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思想各个方面带有根本性的基本建设。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革命群众运动，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动力。这次运动，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一起搞好，坚定不移地使运动达到预定的标准。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胜利地开展这个运动，并且把这项工作长久地坚持下去，可以大大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这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了搞好这个运动，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要使得广大贫农下中农更加敢于当家作主；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



要逐步地做到使贫农下中农群众、基层干部和由上面派到基层去指导运动的干部三方面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要学会正确地处理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那些敌视社会主义而不愿接受改造的分子，则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进行严肃的斗争。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既要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还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农村打下坚固的基础，使各方面的工作出现更大的进步。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凡是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都充满了更为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社队已经出现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经济，大大促进了当前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

这些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巨大的效果，最根本之点，就是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胜利地开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正确地处理和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作了必要的适当的调整。这里包括：认真教育农村基层干部，提高农村基层干部觉悟；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调整和健全基层领导核心；进一步开展农村文化革命，清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毒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阵地；建立和健全农村政治工作制度，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大力发扬大寨精神，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进一步推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和农田基本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充实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改进和健全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等等。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保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地巩固，社会主义的正气不断地上升，可以进一步鼓起人们的干劲，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所以，在所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的到来，都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当前，在全国农村中，一个波澜壮阔的农业生产高潮正在形成和发展。这是全国人民革命精神高度发扬的表现。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有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的。在伟大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最根本之点，就是要从中吸取彻底革命的精神，认真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对革命群众的高度信任和热情支持，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完全相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高涨，全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巨大的跃进。



诗 词 十 首

郭沫若

訪 瑞 金 (二首)

一、叶 坪

弹样丰碑如巨笔 ^① ，	以天为纸急书空：
无产阶级须专政，	世界人民要大同。
蘸血淋漓终古在，	献身慷慨万夫雄。
尔来无数接班者，	高举红旗毛泽东。

二、大 柏 地

马子坳头鏖战处，	关山云树郁苍苍。
岩肤曾染英雄血，	峡腹新栽初稻秧。
弹洞杏坑留旧壁，	诗碑柏地立当场 ^② 。
长虹深幸如相识，	彩练横空舞夕阳。

① 叶坪有革命烈士纪念碑，形式如炮弹，但亦仿佛如大笔。

② 大柏地有碑，刻毛主席《菩萨蛮》词。词中有句云“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鏖战处地名为马子坳，“前村”名杏坑。访大柏地时，适逢其会亦有彩虹出现。



訪 井 岡 山 (七首)

一、桐 木 岭

风来桐木岭，	人上井冈山。
千曲萦公路，	群峰卷巨澜。
翻身根据地，	专政母胎盘。
阳光灑六合，	红星万古丹。

二、在茨坪迎“七一” (調寄《念奴嬌》)

紅旗高舉，井冈山，天下名山第一。挺立罗霄山脉上，纵跨贛湘六邑。领导工农，坚持战斗，一年零四月^①。燎原星火，烧遍天南地北。

梭标血話当年，刺折鋒尖，刻字銘农协。五寸竹釘埋哨口，頑敌魂飞胆裂。桐木岭头，黄洋界上，五哨拱震极^②。全球共仰，万岁欢呼主席。

三、黄 洋 界

海拔一千六百米，	汪洋万岭望黄洋。
雄关如铁旌旗壮，	小徑挑粮領袖忙。
五里横排遺榭树 ^③ ，	千秋蔽蒂胜甘棠。
杜鵑今已花时过，	百战壕边草木香。

四、龙 潭

井冈山上有龙潭，	瀑布奔流迭作三。
樵徑断殘成絕境，	軍工开拓免垂毡。
三潭交响千峰靜，	一井蒼穹万木酣。
土地归农思雨露，	潜龙焉肯鎖深嵐!

① 毛主席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一月下山，向东南开拓新根据地。

② 井冈山根据地以茨坪为中心，为工农政府所在地。四围有哨口五处，曰桐木岭、黄洋界、八面山、双馬石、珠砂冲，均极险要。

③ 黄洋界上旧有小路，曰五里横排。路旁有榭树一株，当年主席与其他同志由宁岡挑粮上山时，曾在此树下歇肩。



五、訪茅坪毛主席故居

解衣推食話當年，	主席恩情涌泪泉。
池里鯢魚階級喻，	案頭石硯斗爭篇 ^① 。
發揚馬列爭民主，	領導工农奪政權。
茅茨二坪星二點，	神州賴以換坤乾。

六、紅軍會師橋

革命風雲怒，	會師有大橋 ^② 。
龍江流碧血，	鵝石卷驚濤。
五井金鑾殿 ^③ ，	萬山卿士寮。
工农須作主，	主席入羅霄。

七、宿永新

領袖親征三度來，	前驅人物費栽培。
長征逾萬參加者，	烈士八千磊落才。
已換九州新日月，	還教四海激風雷。
永新無數佳兒女，	更大光榮爭取哉！

訪南昌(一首)

洪都三十八年前，	革命風雷震九天。
爭取工农新領導，	掀翻日月旧山川。
井岡直比峴岡峻，	綿水竟同延水連 ^④ 。
八一大橋八一路 ^⑤ ，	東風萬里贛江邊。

① 茅坪在寧岡。訪茅坪時，謝氏老人為談當年主席生活頗詳。言主席對彼解衣推食，關懷備至。談時，眼中含着泪光。又指小池中鯢魚相告，主席曾說“鯢魚是大魚，大魚是吃小魚的”，以喻階級鬥爭。樓上居室中，案頭有一圓形辟塵式大石硯，謝老云主席《井岡山的鬥爭》一文即起草于此。

② 紅軍會師橋在寧岡龍市。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朱德同志率領部分南昌起義軍，與毛主席會師于此。橋下為龍江，附近有小村，名鵝石。

③ 茨坪有五井，即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所謂井者乃四山之中有平坦的田地。民間諺語云：“行洲府，茨坪縣，大小五井金鑾殿。”行洲在遂川縣境內。

④ 綿水指瑞金綿河，延水在延安。

⑤ 贛江上解放後新建大橋名八一大橋。又南昌拆城後，城址已拓為馬路，名八一路。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矛盾恐惧症

毛 况 生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叛徒行徑，同工人运动史上的一切叛徒的行徑一样，是有一套叛徒哲学来为之服务的。他們的叛徒哲学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矛盾恐惧症。他們最害怕阶级斗争，最害怕革命，因此，在哲学上也就最害怕谈论矛盾。他們用尽各种诡辩和欺騙的伎俩，企图掩盖、抹煞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苏联社会的阶级矛盾，从而否认解决这些矛盾必须通过革命、通过阶级斗争。他們的哲学家大肆宣扬融合矛盾、调和矛盾的观点，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相对抗，妄图从理論上为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路綫辯护，为他們背叛人民、背叛革命、对美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叛徒行徑开脱。因此，揭露和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矛盾恐惧症，对于剖析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是十分必要的。

事物的矛盾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这个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正是立足于

科学地观察和分析矛盾的基础上的。

我們党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作为观察世界命运的工具，指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間的矛盾。在这些基本矛盾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是目前世界的主要矛盾。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目前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我們党对这些矛盾的性质和它所引起的斗争，进行了全面的具体的阶级分析，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条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綫。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中，将这条总路綫概括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陣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沒有



帝国主义、沒有資本主义、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完全抛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辯证法，特别是作为辯证法的核心的矛盾学說。他們无視当代世界客观存在的各种基本矛盾，竭力反对由这些矛盾所引起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实际上否认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不承认这个矛盾是目前世界的主要矛盾。他們竭力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散布“殖民主义消失論”。他們說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消灭殖民主义制度的完成阶段”^①，現在“为經濟独立、为社会进步而斗争成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絕大多数人民的中心問題”；“为裁軍而斗争，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切身事业”^②，等等。他們还竭力美化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說它“最有預見”，会在挨打之前五分钟“退出殖民地”^③，而且还可能把裁軍节省下来的錢“援助”落后国家，“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濟发展开创一个嶄新的紀元”^④。这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就不再成为剝削者和侵略者了，它不但願意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平共处”，而且变成援助殖民地人民翻身的“救世主”了。哪里还談得上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呢？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还有什么必要呢？无怪乎他們恶毒地咒罵民族解放运动了。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实际上否认資本主义国家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他們借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力量的强大，向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散布“和平过渡”的幻想，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們硬說“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現了新的前景”^⑤，那就是“現在在一系列国家中可以形成压倒反动派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反动阶级了解到反抗是毫无希望的，他們除了向革命的人民投降而外，再沒有任何别的出路”^⑥。这就是說，資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已經改变了，用不着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他們就会把政权双手捧献给无产阶级而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这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把資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垄断資本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任务，一笔勾銷了。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实际上否认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垄断資本集团同垄断資本集团之間的矛盾。他們硬說社会

-
- ① 赫魯曉夫 1961 年 10 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綱領》的报告。
 - ② 赫魯曉夫 1963 年 12 月 21 日回答阿尔及利亚等国报纸编辑部有关当前民族解放运动問題。
 - ③ 赫魯曉夫 1961 年 10 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 ④ 赫魯曉夫 1959 年 9 月 18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
 - ⑤ 赫魯曉夫 1956 年 2 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 ⑥ 庫西宁主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603 頁。



主义体系威力的增长，改变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大肆宣扬帝国主义的“一体化”。他们还说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联合起来的趋势大大加强了”。如果过去帝国主义者们在争夺市场、原料和投资场所方面从事战争冒险的话，那末，现在已“采取共同行动”了。这就是说，帝国主义阵营本身所固有的、必然引起它们内部尖锐斗争的矛盾，已根本不存在了。这就等于否认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否认革命的人民有必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这就是吹嘘帝国主义力量的统一和强大，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他们的投降路线制造根据。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虽然在口头上也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但应该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狡猾性和危害性，也正表现在这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企图主观地、简单地用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去代替当代世界的其他基本矛盾，否定其他基本矛盾及其所引起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抽掉这一矛盾本身所包含的全部阶级内容，竭力鼓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长期和平共处”^①，可以“通过和平竞赛，首先是通过经济竞赛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②。他们并且蓄意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进一步归结为美苏“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全面合作”。无论过去和现在，他们都是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美苏两国的“强大”，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对世界和平所承担

的“特别责任”。说什么美苏两国“在许多方面决定着世界关系的总的状况”^③，只要它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末就不会有战争”^④，就没有谁“能使国际局势复杂化”^⑤。他们甚至认为，只要美苏两个大国的首脑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⑥。

可见，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眼里，只有“美苏合作”来主宰世界，决定人类命运，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等等，统统是没有意义的。“美苏合作”就是一切，其他都微不足道。这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贯标榜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在谈到苏联社会情况的时候，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竭力抹煞苏联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说：“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剥削阶级“早就消灭了”，苏联社会形成了具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世界观”的“新的历史共同体”，无产阶级专政

- ① 赫鲁晓夫 1954 年 6 月 12 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② 赫鲁晓夫 1958 年 2 月 21 日答墨西哥《至上报》记者问。
- ③ 赫鲁晓夫 1962 年 12 月 31 日答英国《每日快报》问。
- ④ 赫鲁晓夫 1961 年 9 月 5 日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苏兹贝格的谈话。
- ⑤ 赫鲁晓夫 1961 年 9 月 8 日在苏联印度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 ⑥ 葛罗米柯 1962 年 12 月 13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



已經不必要了，苏維埃国家变成了“全民国家”，无产阶级的党也就不必要了，苏联共产党变成了“全民党”，等等。

但是，紙是包不住火的，謊言即使再动听也无法掩盖事实的真相。铁的事实是：在苏联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今天的苏联，已經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在所謂“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謂“全民党”的幌子下，把苏联共产党引上了开始蜕化变质的危险道路。他們的所謂“通过和平經濟竞赛战胜资本主义”，所謂“赶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拆穿了，也就是企图把苏联变成以美国为蓝本的资本主义社会。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路綫，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反对革命的路綫。他們推行这一条路綫的目的，就是要在世界上维护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統治，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条路綫完全排除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这条路綫实际上就是妄图把世界各国的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都“融合”于、“統一”于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摆布之下。

二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既然在政治上彻头彻尾地实行了背叛人民、反对革命，背叛社会主义的投降路綫，他們在哲学上，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辯证法，也就是必然的了。他們的哲学家为了替赫魯曉夫修正主义

路綫提供“理論”根据，連篇累牘地写了許多哲学著作和文章，竭力歪曲和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辯证法，特别是集中篡改关于矛盾規律的学說，大肆宣揚矛盾融合論。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哲学家，硬把現阶段人类社会里客观存在着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說成是非对抗性的。他們說：“社会发展的对抗性矛盾不仅不再是人类社会矛盾的主要的或普遍的形式，而且也不再是决定人类社会命运矛盾的矛盾形式。新的、真正合乎人性形式的矛盾即非对抗性矛盾现在愈来愈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进入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心去了。”^①

他們自己又解釋說：“如果对抗性統一的形式更替意味着对立面愈来愈分离、两者的联系削弱、两者的对抗性加深，并以这个統一的分裂和崩潰而完成，那末，非对抗性統一的形式更替則表现为对立面的接近、两者联系的巩固、两者之間差别的逐渐消失”、“逐渐失去对立面的性质”^②。

妙极了！他們嘴里的所謂“非对抗性矛盾”，說来說去，仍然复归为对立面的“融合”，是“对立面发展趋势的一致結果”^③。当然，解决这些“矛盾”，就只需“通过对对立面的結合（融合）去克服对立面”^④，而对立面的斗争也就完全是多余的了。他們就是这样把馬

① 見《莫斯科大学学报》1960年第4期。

② 《論对立面統一的定义問題》。苏联《哲学科学》1963年第5期。

③ 《社会发展中的辯证統一形式》。苏联《哲学問題》1961年第7期。

④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哲学領域內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苏联《哲学問題》1962年第3期。



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篡改成为对立面的融合论。

其实，他们主观臆造的所谓对立面的融合论，是根本站不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矛盾的同一性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一切矛盾都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够解决。如果否认矛盾的斗争性，或者否认斗争的绝对性，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矛盾。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压迫民族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等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发展为革命和战争。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①。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方面，同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者，大讲什么对立面的“融合”，把这个双手沾满了世界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装扮成为可以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合作的和平天使；另一方面，却百般辱骂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特别是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胡说什么他们主张“通过发动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想使“美苏冲突”，把人类推向“热核灾难”，等等。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心目中，世界上的“侵略者”，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

主义，而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的人民。这样，他们不是恰恰把自己放到了与全世界革命人民完全对立的地位上吗？全世界人民从这里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了他们宣扬矛盾融合论的反动本质。原来他们嘴里的所谓“非对抗性矛盾”，只不过是抹煞敌我矛盾，替他们认敌为友的叛徒行径作辩解而已。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哲学家，大肆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公式已经过时了”。他们硬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正在熄灭的矛盾”，会“逐渐地化为乌有”。因此，不能说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统一”、“一致”才是“最重要的动力”^②。在这里，不仅是对立面的“融合”，而且对立面本身也不存在了。他们对坚持用矛盾规律来观察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胡说什么这是不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形而上学地对待矛盾”^③，认为“大肆宣扬这种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是荒谬可笑的”，是“对矛盾的无根据的崇拜”^④，是“小资产阶级把矛盾神化了”^⑤，等等。可见，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及其哲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22页。

② 《社会发展中的辩证统一形式》。苏联《哲学问题》1961年第7期。

④ 《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辩证法问题》。苏联《共产党人》1960年第13期。

③⑤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哲学领域内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苏联《哲学问题》1962年第3期。



学家们的眼里，“矛盾”是个多么不吉利、多么可怕的怪物啊！

总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总是幻想绕开矛盾，幻想如果世界上的一切矛盾都没有了，一切矛盾都调和起来了，那该是多么美妙啊！那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同美帝国主义者拥抱、亲吻，大做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好梦了！

但是，不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人类社会总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前进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认为，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将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永远存在的，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矛盾的性质有所不同罢了。没有矛盾和矛盾双方的斗争就没有发展，人类社会就要停止前进，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社会主义社会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来，无疑地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这并不像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没有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了。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伟大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他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①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处于执政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两类

性质不同的矛盾，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并保证胜利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借口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其目的就是要掩盖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路。

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矛盾恐惧症，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

害怕矛盾，从来就是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所固有的顽症。任何反动统治者都是幻想永久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最怕被人民群众推翻，因此他们最害怕从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中得出革命的政治结论。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否认矛盾，掩盖矛盾，把矛盾说成是最不正常的“病态”，而把他们所统治的黑暗社会，描绘为最正常最合理的社会。他们把敢于揭露矛盾的一切科学思想，都斥之为“异端”，把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反对他们的剥削和统治所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视为“大逆不道”。他们越是走向腐朽、没落，矛盾恐惧症就发作得越厉害，对人民、对革命所采取的镇压手段也就越残酷，因而就越需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制造各种各样的诡辩和邪说来掩盖矛盾，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和实质。

大家知道，反动的资产阶级是掩盖矛盾、欺骗人民、打击革命的老手，因为他们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



的阶级利益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即使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总是企图以各种方法来掩盖和抹煞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他们的思想家在当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空洞的口号，大力宣扬什么“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类之爱”，等等，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贴上了“无矛盾”的标签，企图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矛盾，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但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毕竟是心劳日拙的。不管资产阶级的主观愿望如何，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为自己造就掘墓人，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是抹煞不了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激化了，这就造成了世界革命风暴的源泉。在世界各国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面前，特别是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广泛传播开来、日益深入人心的时候，资产阶级的说教，资本主义“福音”的宣传，已经越来越不起作用了。帝国主义者为了瓦解和扑灭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以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不得不寻找帮手。他们从工人运动队伍内部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修正主义者。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在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伟大时代，适应着美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而产生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国内代表苏联社会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个特权阶层实际上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

侵占着全体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同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共党员和干部都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因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害怕得要命，对真理的声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声音害怕得要命。让人们“在和平、统一中生活”，而不要“在矛盾中生活”^①！这就是他们的格言。

在国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了保持他们既得的经济利益和维护他们的政治统治，并且进一步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需要掩盖和抹煞苏联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欺骗与麻痹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他们除了运用资产阶级武库里那套“全民的”、“超阶级的”虚伪理论来愚弄苏联人民之外，还特别挂起了“共产主义”这块招牌，在国内许多重要问题上散布了一系列蛊惑人心的言词，提出了许多骗人的口号，许下了一堆又一堆的、从来没有实现也根本不打算实现的诺言。

在国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了实现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霸世界的阴谋，他们不仅自己背叛革命，还要压迫和控制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不准他们起来革命。为了反对和扑灭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也同帝国主义一样，感到需要寻找帮手。于是，他们同美帝国主义者就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越胜利、越发

^① 《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的相互关系》，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力量越强大、越发展，就越使得他們心神不安，坐臥不宁。他們也就越需要掩盖矛盾，欺騙人民，以便加紧同美帝国主义勾結，絞杀和反对世界人民的革命。在刚果問題上是这样，在越南問題上也是这样。最近，当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南越的失敗，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的时候，当全世界人民都同声譴責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野蛮侵略罪行，并且积极支援南越人民的武装斗争的时候，赫魯曉夫的继承者却施展两面派的手法，一面作一些“支持越南”的小动作，一面却配合美帝国主义玩弄“和平談判”的阴謀，把越南問題納入他們所謂“和平共处”和“美苏合作解决世界問題”的总路綫的軌道，企图扑灭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們还积极支持美国利用联合国的所謂“維持和平行动特別委员会”，建立一支常設的联合国武装部队，来替美帝国主义镇压和扑灭各国人民革命服务。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矛盾恐惧症出現于当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害怕核武器。

他們被核武器吓破了胆，完全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詭詐政策，不仅自己放弃斗争，背叛革命，还要詭詐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放弃斗争，放弃革命。他們到处宣揚核战争的恐怖，說什么“原子弹不遵循階級原則”，“不会辨別帝国主义者在哪里，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①。“它将毁灭一切生物”，毁灭我們自己的“諾亞方舟”——地球。核武器出現以后，人类是生活在“一个装满热核武器的火药庫里”^②，“就好像一个被处死刑的人头上悬着断头台的鋸刀的情形，这个人只

好躺在那里等着，不知什么时候这把鋸刀会落下来把他的头砍掉。”^③在他們看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革命原則都失去“时代”的意义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人类的命运是掌握在人民群众自己的手里。不管核武器或其他的新式武器具有多么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归根到底总是制約于人，制約于階級斗争，服从于階級斗争的規律，而决不可能消除或改变階級斗争的規律。所以，尽管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在“蘑菇云的怪影”面前吓得魂不附体，完全抛弃了階級分析和階級斗争的原則，但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絕不会因此而停止战斗，停止革命。

让現代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者 and 一切反动派都在矛盾規律面前发抖吧！俗話說得好，魔鬼害怕太阳，太阳决不会因为魔鬼的詛咒而不从东方升起。尽管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老爷們”，都害着严重的矛盾恐惧症，但是矛盾作为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永远是客观地普遍地存在着。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克服，就是宇宙間万古常新的辯证过程。在不断地揭露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将更好地成长壮大起来，加速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定将在全世界实现！

① 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② 赫魯曉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报告。

③ 赫魯曉夫1958年1月22日在白俄罗斯农业先进工作者會議上的讲话。



教 练 工 作 杂 记

· 傅 其 芳 ·

我从事国家乒乓球代表队的教练工作好几年了，参加世界锦标赛也已经好几届了。在工作中，有一些经验，也有许多教训，都还没有系统地加以总结。这里记下的，有的是我的直接感受，有的是从别的教练员那里得到的启发；有的是已经实践过的，有的还没有能够完全做到。

依 靠 运 动 员

教练员和运动员的目标是一致的：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在比赛中取得胜利，为集体争光，为祖国争光。但球是靠运动员去打的，如果他们的积极因素没有调动和发挥，任凭指挥有多大本事，也要输球。在教练工作中，我深深感到，必须相信运动员，依靠运动员，工作要从运动员出发，又要落实到运动员身上。

教练员的职责是指导训练和比赛。教练员虽然有一定的训练和指挥的经验，但我们国家队教练员的技术水平，一般是不如运动员的。我们的队员有一些已经是世界冠军，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实战经验很丰富。如果教练员光强调“你听我的”，凭自己想出的一套去发号施令，是行不通的。首先应该

放下架子，虚心向运动员学习，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

我认为，教练员在指导训练中，不应当要求运动员一切按照自己说的去做，而主要是引导运动员自觉地把领导的指示和运动训练的方针、原则，在训练和比赛中具体体现出来。无论训练计划或作战方案，都让运动员根据总的要求，结合各人的特点，自己来制订。正确的，就加以肯定；有问题，就提出来共同研究，加以补充或修改。这样，运动员感到计划是自己的东西，执行起来就特别坚决。有时候，运动员与教练员在某些问题上发生分歧，经过耐心说服也没有得到统一，就可以同群众一起讨论，研究解决。如果运动员还不通，也不要急于下命令，假使时间允许，不妨让他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试验一番，实际教训更为可贵。何况有时错的倒可能是教练员自己呢！教练员还应和运动员一起大胆试验新技术，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促使大家开动脑筋。训练中，教练员切忌包办代替，要善于启发运动员朝正确的方向努力，当好引路人。

教练员对运动员的思想和技术，都应当有严格的要求，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爱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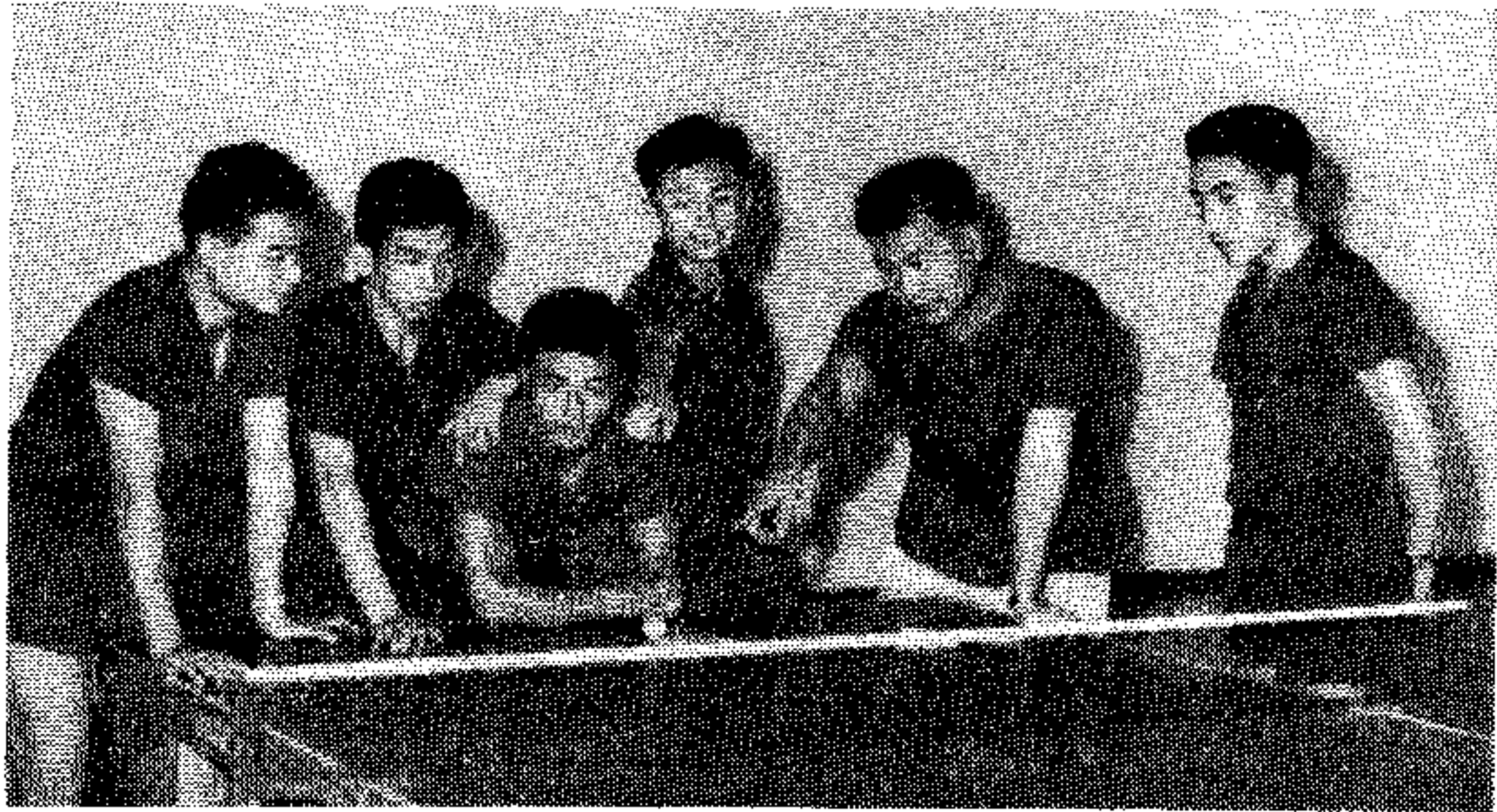


特别是当他们的技术越来越高，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应当抓得更紧，要求更高更严。因为，这时运动员容易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出现苦练劲头不足的现象，而技术水平越接近尖端，提高越困难，需要付出更艰辛的劳动。因此，教练员必须要求运动员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坚持严格训练，进一步掌握高难度的技术，攀登新的世界高峰。

要抓好技术，必须抓思想。只有抓了思想，才能抓到技术的根。一九六二年，我们从日本访问回来，感到李富荣的左方推挡必须加强。我几次与他研究，找出许多训练方法，帮助他提高。可是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仍不见有多大的改进。有一次和他谈心，他才告诉我：有人说他一上场比赛就必须左右奔跑，拚命侧身，打得满头大汗才能胜球，缺乏“大将风度”；一个著名运动员应该能很轻松、很随便地来几下就将对方打败，才显

出自己的本领。由于受了这种说法的影响，他想改变自己原来靠右边攻的打法，改成两面开弓，对加强左方推挡就不积极了。了解到他的思想后，帮助他正确认识自己打法的优越性，珍惜已有的基础，坚定了他的信心，促使他努力加强左方推挡，使自己的风格更鲜明，在技术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件事使我深刻认识到，我过去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他的思想根源，光从表面现象去抓技术，那是隔靴搔痒，根本不能接触到问题的实质。而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技术问题才能很快地得到解决。

教练员必须又红又专，认真改造思想，这是做好思想工作的先决条件。教练员先要明确为谁工作，才能帮助运动员明确为谁打球。教练员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精通业务，才能够看得远，看得准，正确地帮助运动员提高。



教练员与运动员一道研究技术



我和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是亲密的同志。我有什么问题，敢于向他们暴露，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也尽量帮助他们分析，找到解决的办法。通过做思想工作，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经常交心，相互之间更信任了，即使在关键时刻，也能大胆暴露思想。周兰蓀在二十八届单打中迎战木村，开头打得很好，连胜两局，可是第三、第四局被木村追了上来。这时他跟我说：“我有点手软。”在这样的时刻，一般人是很怕人家说手软的，更不用说自己承认了。但他信任教练员，老老实实地说了心里话，我们场外指导就能对症下药。当时就不跟他谈技术了，而是给他做政治鼓动工作，帮助他在关键时刻敢打敢拼，终于淘汰了木村。当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不少缺点，有时思想工作做得不透彻，使个别运动员不愿把思想活动及时说出来，以求得解决，因而造成失败。

教练员参加训练，获得实际经验，做到身教言传，可以鼓励运动员积极锻炼，同时会使运动员对教练员感到亲切。

群众路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方法，在教学训练中也不例外。相信运动员，依靠运动员，启发和引导运动员的自觉性，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去争取胜利，这就是群众路线的训练方法。

练为战 不为看

比赛是平时训练的检验。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在比赛中取得胜利。无论技术训练或

战术训练，都必须坚持“练为战”的原则。

基本技术是战术的基础，要下苦功练。但练基本技术必须结合实战，要在走动中练，才能练活。练定点时应有全面观念，练左方时要想到右方，练手法时应结合步法。更重要的是不要把技术和思想分割开。

练习时，既要考虑前一板，又要想到下一板，不要孤立地练一板球。既想自己，也要想到对方。

训练中不要单纯追求球的来回次数，贪图练得称手、舒服、好看，而造成假象。应从不舒服练到舒服，然后再找不舒服，这样不断加大难度，不断突破难度，技术才会不断进步。有些运动员往往练成“花枪”，中看不中打。

训练中必须狠抓特长和有助于发挥特长的技术。特长过硬，是取胜的一个基本条件。特长提高了，相对地会弥补薄弱环节。例如，主动进攻加强了，必然会使被动防守的情况减少。补短板也是为了促使特长能够更好地发挥。徐寅生攻斜线是特长，但在比赛中，只有一条线，容易被对方盯死，后来，他再练一些直线进攻，对方就不能集中防一点，斜线球的威力也就更能够充分发挥了。

在有限的时间内，要突出主要技术的训练，不能贪多。这个放不下，那个也想要，反而什么也抓不深，抓不透。乒乓球训练中，也应该贯彻“少而精”的原则。

练战术也是这样。单个战术应针对“敌情”，一个一个地练。练综合战术时，必须在



全面运用的基础上，突出一个主要战术。也可以說，一切战术练习，都是为了发挥自己最有利的技术。

运用战术，就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力争主动，以夺取胜利。守球运动员以落点、旋转控制对方，争取主动。张燮林，从表面看来，老是在被对方进攻，但他把球削得又稳又低，又用旋转变化送两角，逼使对方左右奔跑，实际上主动权却掌握在他手里，而且一有机会便立即反攻。攻球手相遇，在双方水平相当的情况下，谁能先发制人，抢攻在先，谁就能占优势。有的攻球手觉得抢攻冒险，稳一些好，或想等好机会再攻，往往被对方先攻了，受到压制而遭失败。因此，有没有勇气抢攻，经常成为比赛胜败的关键。这和作战一样，只有发扬火力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如庄则栋三次败给高桥，都因为没有攻在对方之前。在第四次交锋前，庄则栋总结了这一点，大胆进攻，将高桥的火力压住而连胜三局。

战术变化总的要求是，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设法调动对方。但有时需要以特长对特长，或特短对特短。后一种打法，在对方准备不足，或恰好克制了对方的优点的情况下，也可能打得通。因为特长与特短的关系是相对的，当某个运动员的特长与对方特长相比，对方比他好，可是他的短处却比对方强的时候，教练员就应当果断地让他试用短处。例如，在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孙梅英对关正子，开始运用自己的特长与对方打快攻，却并不占上风，形成相持局面。后来

她改用搓攻，将速度慢下来。搓攻虽非她所擅长，但使对方快攻不能发挥。最后，以三比二淘汰了关正子。

战术要多样化，要根据当场情况，该变则变，不该变就不乱变，也不要让对方摸到自己的规律。对方盯住自己的缺点连续进攻时，应集中力量顶住，然后再变化战术，进攻对方的缺点，以摆脱自己的被动。

守球运动员平时练稳削，就是准备比赛时对付稳拉。有人一比赛就怕攻球运动员稳拉，这是多余的顾虑。试想，为什么对方拉得稳？这是自己削得稳了，才显出对方拉得稳。如一方守不住，另一方也显不出拉得稳不稳了。打攻球的人只能稳拉你，说明他已失去猛扣的能力了。因此，应坚定地相信自己削球稳健的特长，思想上首先稳住，然后伺机反攻。何况，对方又何尝不怕你稳削呢？林慧卿、郑敏之在二十八届团体赛中，能用稳削战胜深津尚子和关正子的稳拉，原因就在于思想上先顶得住。

战术的运用和变化，必须在日常训练中根据实战需要，反复练习，才能在比赛中运用自如。在制订训练计划时，不能仅仅针对目前所了解的外国强手的情况，还要把他们今后可能有的发展估计在内。

用兵排陣

团体赛中，一张比较理想的出场名单，在旗鼓相当的情况下，能起不小的作用。有时比赛双方排阵名单一揭晓，大局便已定三分。



比赛同打仗一样，“兵力”的部署，必须建筑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对双方实力都要有正确的估计。这就需要教练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要对自己队员的思想风格、技术特点了如指掌，还要多方面了解对手的情况。掌握了材料，才可能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下决心。教练员在考虑出人时，不要因某个选手一场比赛的得失，而动摇对他的全面估价，也不要只看他过去的成绩，而忽视临场的精神面貌和竞技状态。

在估计对方水平时，特别是对那些接触不多的外国青年选手，应估计到他们的变化比老将们更大。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技术，而且要尽可能地了解对方的精神状态，连教练员的风格也要尽可能地了解，例如，他比较老谋深算，还是比较大胆泼辣？这在排名单时颇有参考价值。

二十五届世界锦标赛男子团体复赛中，我队输给匈牙利，丧失了与日本争冠军的决赛权。当时匈牙利的别尔切克一个人独得了三分。二十六届时，别尔切克的技术仍是匈队中最好的，因此，在这届团体复赛中，中匈两队相遇时，我们对双方排阵作了如下的估计和考虑。

根据男子乒乓球团体赛排阵的规则，主队三人所打的场次是：第一主力打二、四、七场，第二主力打一、五、九场，第三主力打三、六、八场。客队：第一主力打三、五、七场，第二主力打一、四、八场，第三主力打二、六、九场。这是一般规律，有时由于

双方实力的相尅相成，会引起主队的第二、三主力，客队的第一、二主力位置的变化。一般总是让技术最好的运动员打二四七或三五七位置，这样可以在第三轮打在最前面，争取在前七分中就取胜。因此，我们估计，别尔切克会排在这个位置。我们还考虑，主队二四七位置比客队三五七位置更重要，因为前者在前两轮比后者打得更早一些。如对方猜到优先权，他们会挑选主队，我们猜到优先权，我们就挑选客队，也把主队让给对方。那么，别尔切克打二四七位置会更肯定了。别尔切克的特点是第一分打顺了，以后两分会越打越好，反之，则易泄气。因此，要考虑如何先把别尔切克的气挫下去。当时我队出场的是徐寅生、容国团和庄则栋，实力比对方均匀，三人中对付削球最有办法的是徐寅生，照正常的安排，应让徐寅生打第一主力，至少应排第二主力。但我们为了打好对别尔切克的第一场关键性的战斗，将徐寅生排在第三主力的位置，打二六九场，争取让别尔切克一上来就碰最硬的对手。果然两人相碰，徐寅生以二比〇取胜。别尔切克出师不利，在对庄则栋与容国团时也很快输了。

由此可见，在排名单时要经过分析，估计对方谁出场和可能的排阵。在这方面，既有一般的规律，也有为了针对第一个强手或弱手，而将位置改变的情况。既然你猜对方，当然对方也同样在猜你，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错综复杂的变化了。

二十七届中日男子团体决赛，当时获村



是日本队的核心人物。在我们访问日本时，他先后打败徐寅生和李富荣，而负于庄则栋。因此，我们挑主队后，他们会估计庄则栋打第一主力的位置，因而获村打三五七的第一主力位置可能性就很大。这样他就可以先对张燮林和徐寅生，在最后一轮时才对庄则栋。我们根据这样的分析，将张燮林排二四七位置，这样，可以先对三木，再对木村（当时木村情况比三木好，估计木村会排一四八位置），在第三轮才对获村，因为获村对付削球比木村和三木的办法多一些。后来实际情况符合我们的估计，这场决战以五比一取胜。

至于二十八届男子团体决赛时，由于我们五名队员实力均匀，确定出场的阵容坚强，因此根据自己的实力，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去排阵，就不是很大的难题了。

当然，用兵排阵是双方斗智的一个内容，但比赛终究要靠运动员去打，所以更重要的是运动员具有过硬的思想和技术。否则，再好的布阵，也只是空中楼阁。

临 场 指 挥

乒乓球比赛往往瞬息万变，教练员应在了解双方思想、技术状况的基础上，善于抓住关键，当机立断，帮助运动员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教练员应当像打仗时的指挥员一样，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勇敢而明智的指挥者，而不要成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不但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局变化发展的能力。

比赛局势的变化，无非出现三种情况：领先、相持、落后。应该帮助运动员正确对待这几种不同的情况。

领先，本来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技术不比对方差，可是有些运动员对自己缺乏信心，怕对方追，反而觉得“领先球难打”。有人在十七比十一时，由于求稳输了几分，就好像大祸临头，慌张焦急，怕对方会追上来。其实，这时还领先好几分呢！怕什么！给对方追平了，也是双方相等，毫不吃亏。即使被对方超过几分，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他领先以后，也可能想稳住，变软了。这时，只要你大胆进攻，仍然可能夺回胜利。何况从领先到落后，正好总结对方的战术，有利于自己改变战术。所以，在领先时，应充分利用有利形势，一鼓作气干到底。怎么赢的，就怎么打，决不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除非对方改变战术，一般自己不宜主动变，不到二十一分，决不罢休。应主动地力争胜利，不要依靠对方的失误而等待胜利。因为对方一落后，往往会孤注一掷，拼命搏杀。所以千万不能求稳，思想一稳就变成保守，打法自然就变软了，对方就有机可乘，会进行反攻。周兰蓀对木村，一上去猛冲猛打，连胜两局，第三局，认为胜利在望，心中想稳些，手就软了，被对方连追两局。决胜局坚决进攻，才夺回胜利。

在比分紧紧咬住的相持关头，有人因为心里紧张，就不问时机，拼命打，看起来很凶，实际上是虚弱的表现。乱打不等于敢打。这样，一度相持的局面会很快变为落



后，最后輸掉。所以，在自己紧张时，要想到对方也在紧张，如果你不紧张，对方就可能更紧张。相反，对方看到你紧张了，他可能会不紧张。也有人一到相持，个人杂念就冒头，考虑各种问题，怕輸了以后会怎样怎样。这么一来，就变得縮手縮脚，不敢放手打，老想等更好的机会，因而該打也不打。在这时候，應該不考虑个人得失，更加勇猛頑强，不放过任何机会，搶攻在前，但也要避免胡乱起板。运动员一般在相持阶段手軟的多，誰能搶在前头打，力爭主动，誰就能获胜。

落后时不要气馁，要克制“不要了”的想法，也不要为前一局或前一分該胜未胜而惋惜、后悔。必須高度集中精力，打好眼前的一分，狠狠咬牢对方，才能轉败为胜。即使追不回来，也可以使对方感到害怕，挫伤他的銳气，为下一局或下一場創造有利条件。同时，要冷靜地找原因，是风格沒有發揮还是战术錯誤？找到原因后立即改变，不要从头至尾用一套战术。

判断战术是否正确，不能光看勝負几分球，正确的战术有时会由于运动员打得不果断，偶然的失誤，以及对方在无意中打回来等等情况而輸球。这时，应鼓励运动员大胆坚持原訂战术，不要輕易动摇。但有时虽然只輸了一两个球，却是战术錯誤，那就要立即糾正。有时也会在无意中胜了一两个球，是事先沒有估計到的，可是恰巧打中了对方的要害，这时就应告訴运动员，立即向这方面突破。

临場指揮必須十分沉着，善抓关键，迅速发现对方意图所在。教练员的情緒往往直

接影响运动员，赢了一局或两局，不要过早高兴而放松警惕，要帮助运动员从胜利中找缺点。因为一般不会胜二十一比〇，可以从輸的几分中找原因，并准备下一局对方改变战术。輸了一局或两局，教练员切勿丧失信心。要使运动员不服輸，首先教练员要不服輸。这时，应帮助运动员找优点，因为一般不会輸〇比二十一，可以从赢的几分去分析，告訴运动员怎样变。不要只讲“这不好，那不对”，应从鼓励士气出发，指出具体怎么办，切忌訓一頓。一局下来，跟运动员談一两点最要紧的，不能繁瑣，因为時間很短，說多了等于沒說，运动员記不住。而且要根据不同人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有时提醒运动员的，不一定是技术、战术，往往几句政治鼓动的話更为有效。

教练员不要怕运动员上場后不听话。如果在赛前和运动员一起充分估計各种情况，定好多套战术，作好各种对策，临場就不会有什么分歧。在場上，不宜強調运动员必須絕對服从場外指导。你对他有信心，他才对你有信心，最后落实到他对自己有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信心的产生是建立在平时工作的基础上的，你能把运动员的思想和技术问题都解决好，信心才是真正落实了。如果場上出現意外的变化，运动员可以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因为球是运动员在打，教练员无法代替。

球賽如果輸了，不要互相埋怨，更不应責怪运动员。賀龙副总理指示我們，教人先教好自己，教练员能过硬，运动员才会过硬。运动员打不好，教练员应当首先檢查自己沒教好。当然，这并不是一下子包攬在自己身



上了事，而是負責和運動員一起把這場球失敗的原因找出來，記取教訓，並在今後的訓練和比賽中注意糾正。這樣，雖然失敗了，但這是勝利的開始。如果贏了，更不能歸功於自己的指揮，應該明確這是運動員打得好。教練員在這時候特別需要冷靜，不能沾沾自喜，要認真尋找不足之處，幫助運動員繼續前進。如果認為已經沒有問題了，這場球雖然贏了，但已埋下輸球的種子。驕傲自滿、停滯不前的人，肯定要遭到失敗。

集 體 的 力 量

一位外國乒乓球專家曾經說：“中國乒乓球運動進步很快，但是他們還缺少有經驗的指導人材，因此他們還不足以奪取世界冠軍。”這是多年前說的，但我還常常想起這段話。現在，我們已連續幾屆獲得了世界冠軍，是不是說我們每個教練員的水平已經很高了呢？不能這樣看。

說我們缺乏經驗，仍然是事實。孫梅英、容國團等同志放下球拍還不久，其他幾位教練員和我自己做教練工作的時間也不長，對這項運動的知識還是有限的。至於指揮藝術，還開始摸索。從這一點看，應該說，由於我們有時指揮不當，即使最好的運動員，也會遭到失敗。但這只能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

更重要的還有另一方面，這就是個人指揮與集體指揮問題，個人智慧與集體智慧問題，個人經驗與集體經驗問題。因為我們依靠的不是個人，而是依靠黨的領導和集體的力。我們不僅有教練員們合作共事的集體，還有與領導、運動員的三結合。

我們在黨的教育下，明確了為革命而工作，能團結一心，集思廣益，為共同的目标奮鬥。重大的計劃或方案，都是在領導同志的親自指導下，發動廣大運動員和教練員充分討論，集中群眾的智慧，制訂出來的。最後還經過組織審核批准。這樣產生的計劃和方案，會比任何個人所設想的優越得多。

在教練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儘管在具体业务上，我們作教練員的會比一些領導同志了解得稍多一些，但這並不等於在訓練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我們比領導同志更高明。而是恰恰相反，訓練中的方針、原則，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制訂的，訓練中的重大問題，也往往是領導上及時提出的。領導同志看問題更全面更深刻，抓得更准更有力。這樣的例子隨手就可舉出很多。例如，為了對付“弧圈球”，我們曾一度讓一些隊員過多地去適應這種球，結果影響了我們快狠的風格，領導上及時指出了這個問題，作了糾正。又如，二十七屆男子團體決賽名單，排張燮林打二四七的位置時，我曾擔心他體力是不是吃得消。領導上認為這樣排最有利，讓我去問他本人的意見，如果他认为可以，就堅決這樣排。後來問張燮林，他回答：“你敢排，我就敢打！”這就不僅促進我下決心，而且增強了信心。這種集體的力，是有些專家不可能了解的。因為在他們的實踐中，缺乏或者沒有這一方面的經歷。

作為個人來講，我們確實不能說指揮水平很高了，但是，有了黨的領導，有了教練員和運動員的通力合作，集中了群眾的智慧，我們就能够比較好地進行指揮。

